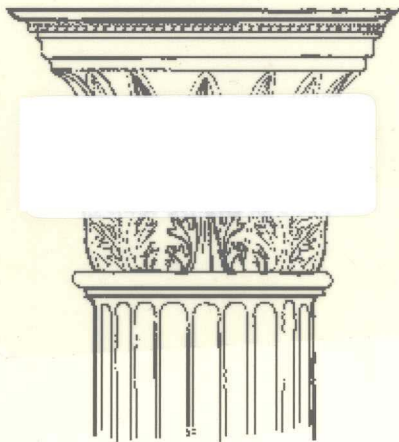


新世纪外国文学： 传承与发展

21st-Centur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主编
段汉武◎执行主编



海译出版社

新世纪外国文学：传承与发展

21st Centur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主编

段汉武 执行主编

海译出版社

2012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外国文学：传承与发展/段汉武主编.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 8

ISBN 978 - 7 - 5027 - 8329 - 7

I. ①新… II. ②段… III. ①外国文学 - 文学史 - 研究 - 现代 IV. ①I1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9686 号

责任编辑：张晓蕾

责任印制：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旺都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23.25

字数：467 千字 定价：68.00 元

发行部：62132549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次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开幕词	陈众议(1)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闭幕词	王守仁(7)

● 外国文论与批评模式的传承与发展

自我禁锢与突围:美国修辞性叙事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申丹(11)
试论重新审视俄苏文艺思想的学科建构意义——暨纪念维·别林斯基诞辰200周年	吴晓都(24)
文学经典与文学的承传	黎皓智(33)
西方诗歌的三大传统	邹建军(44)
胡适的研究方法与严复悖论	何辉斌(56)
法国后现代主义的“知”、“意”、“情”	刘波(65)
中国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六十载回溯	朱振武、蔡亮(79)

● 海洋文学研究与中外文化交流

欧美诗歌中的海洋意象及其生态意蕴	吴笛(95)
并不悲观的悲剧——论康拉德海洋小说的悲剧色彩	熊卉、王松林(103)
解构与反解构——《大海啊,大海》的语言机制	段汉武、米莉(113)
“大海”与“孤岛”——《蹈海骑手》中的代际冲突	张陟(122)
从“海洋文学”概念角度探讨其英文翻译	温辉(130)
《古舟子咏》中的海洋生态意识	毛跃祖(138)
康拉德与帝国主义:以《台风》为个案	王婷婷(144)
《中国印度见闻录》之“黄巢屠蕃事件”释疑	刘彬(149)

● 新世纪初外国文学研究

符号学与当代圣经批评	梁工(155)
------------------	---------

契诃夫之谜:略论契诃夫的艺术革新	张 冰(165)
中岛敦的文字观与庄子思想	郭 勇(175)
论文学的“阴”“阳”——以约翰·福尔斯作品为例	潘家云(186)
醉酒、疯癫的“圣愚”——论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主人公形象内涵	温玉霞(195)
“艺术”、“爱情”与“生命”:《海上夫人》中的三位女性及其象征意义 ——以凌格斯川为中心	杜雪琴(207)
从“善与恶”看《萨勒姆的女巫》中的复杂人性	陈倪茜子(217)
屠格涅夫塑造俄罗斯少女形象的感伤性审美情感	哈斯其木格(223)
诗歌文学空间感的构建——以柯勒律治《古舟子咏》的文体解析为例	王一磊(226)
女性主义思想在《幸福》中的体现	戚德慧(237)
邓恩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	施 盼(243)
图形背景理论视野下的《到灯塔去》研究	寿丽君(249)
《玫瑰园中的影子》的女性话语权之争	翁雨昕(261)
To His Coy Mistress 的功能文体学分析	杨美美(270)
追寻无意识自我实现的旅程——分析心理学视野下的思特里克兰德的研究	叶 群(276)
 ● 外国文学教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史	
他山之石与攻玉之术——英语创意写作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	隋 刚(287)
阐释三境界:外国文学教学的艺术之路	殷企平(309)
关于外国文学教学新模式的探索	沈建青(321)
学术领袖的形成与定位——以冯至为中心	叶 隽(329)
呼唤“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关于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思考之一	汪介之(338)
文学的循环与世界文学的 21 世纪	苏永旭(346)
试评新、旧两部《欧洲文学史》之得失——以台湾的两部同类教材为参照	赵 元(362)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开幕词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陈众议

各位同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和描绘过“全球化”，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如今，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而且这个世界市场网的利益流向并不均等。它主要表现为：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化”或“西方化”，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化。据有关方面统计，20世纪60年代以降，资本市场逐渐擢升为世界第一市场。资本支配者迫不及待地开发金融产品，以至于90年代后期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600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100倍；全球金融产品交易总额高达20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总额的70倍。这是资本逻辑非理性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泡沫成分显而易见，利益驱动和目标流向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资本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思想，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凡此种种，已然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境地。逆之，意味着自杀；顺之，则必定被“化”、被杀。

一、“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一直集中于时间和表象，如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瓦特发明蒸汽机和叶利钦结束冷战时代等。我倾向于将全球化界定为跨国资本主义化，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于是，资本之外一切皆无的时代已经来临，而坊间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或自欺欺人。

首先，经济作为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不可能实现独立的全球化进程。它必然具有政治属性，并导致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迁（“信息高速公路”即互联网在此推波助澜）。如今，以资本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富国如鱼得水，贫国大开血脉。资本所向披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谓的“文化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如是，随着冷战的终结，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以及阿拉伯世界多米诺骨牌式的所谓民主化浪潮的形成，资本逻辑和技术（工具）理性完成合谋。至此，“文化多元化”成为一种表象，甚至假象；盖因在强大的资本面前，理想主义全面崩塌。资本家可以四海为家；而无产者和广大而浮游的中间人言路广开，却基本上只能是自话自说。



然而，正所谓有无相生，祸福相依，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危机、更多的危险。凡事如此，概莫能外；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像钟摆，使世界莫衷一是。如此，“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跨国资本主义面临的第一轮危机也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而且还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反对。“9·11”事件便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这就是说，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牟取巨额利润并发展再生产的同时，正通过低成本及相对廉价的产品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资料形式冲击西方市场，导致西方国家危机频发，并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出现空前深刻的矛盾。

其次，资本无国界的事实导致了“地球村”的产生。它淡化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而利益冲突则日趋尖锐化、白热化。但利益冲突的主体已由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转向资本支配者，从而使民族国家意识逐渐淡化，直至完全淡出，取而代之以更为宽泛也更为具体的利益群体或个人。近来西方国家极右思潮的抬头多少与此相关：延绵2000年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在强大的资本逻辑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一系列传统价值面临瓦解，致使极少数极端保守势力铤而走险。因此，“地球村”一定意义上也即“地雷村”。于是，“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人类面临空前危机：没有是非，只有强弱；没有善恶，只有成败；没有美丑，只有贫富。诸如此类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界限模糊的情状以及“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出现。但重要的是，诸如此类的时鲜谬论恰恰承载着跨国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再次，“多元性”并不意味着文化平等。它仅仅是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很容易让人麻痹，以为这世界真的已经自由甚至大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性”其实也是一个悖论，说穿了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如男与女、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西方和东方等等）的解构风潮在否定简单二元论和排中律的同时，夸大了李白、杜甫各有所爱的相对性。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这恰恰顺应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分你我，没有中心。于是，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使世界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狂欢面前愈来愈莫衷一是。于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界定文学、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借用昆德拉关于小说的说法，或可称当下的文学观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即愈来愈局限于纯粹的个人主义或个性化表演。而这种状况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盖因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显然不仅局限于形而上学范畴，其怀疑和解构本质明显具有悲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并已然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的“多元性”发散态势。

二、价值观是最大的软实力

核心价值阙如或扭曲的民族绝对不可能是强大的民族。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

的全球扩张，传统的民族认同方式受到了冲击和解构，以至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与国家意识正在逝去，并将不复存在。认知方式、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的趋同使年轻一代逐渐丧失了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十分契合跨国公司不分你我、没有中心的去二元论思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而民族虽然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但它归根结底只是个历史概念。犹太基督教思想将民族的发生和发展说成是上帝的安排，并使相关民族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说法。即使是在达尔文进化论流行之后，基督教神学等也能自圆其说，谓适者生存只是一种表象，一切皆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否则许多自然及人类演变的偶然性就无法解释。与之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摩尔根通过考察美洲印第安部落，对民族的产生作出了相对科学的解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将民族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建立在氏族、部落、族群基础上的民族乃是私有制发展的需要，继而成为诸多国家的自然基础。由此看来，民族是一系列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过程。而且历史使然，有生必有死，一旦私有制消亡了，随之不复存在的便是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而种族虽然是个纯粹的生物学概念，却与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为的宗教也是如此。因此，在极端的西方右翼思潮中，民族又常常是与种族和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价值观的持守和重建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发达国家正在或将要面临的历史课题。

三、文学作为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人类藉文学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因此文学不仅是审美的对象，也是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同样，文学的本质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这就牵涉到文学与民族精神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丘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他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

这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更多建立在乡土乡情之上，这显然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关。从最基本的经济基础看，中华民族是农业民族，中华民族故而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自足的“桃花源”式小农经



济和自足自给被绝大多数人当作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而农业民族往往依恋乡土，则必定追求安定、不尚冒险。由此形成的安稳、和平的性格使中华民族大大有别于游牧民族和域外商人。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如是，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当然，我们的传统不仅于此，经史子集和儒释道，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这里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入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断不能含括。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对世界的一元化统治已属既成事实。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乡情、家国道义等正在淡出我们的生活，麦当劳和肯德基，或者还有怪兽和僵尸、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正在成为全球孩童的共同记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正在令人绝望地全球趋同。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取向也从重道轻器转向了重器轻道。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向我们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传统定义上的民族意识正在消亡。

然而，民族认同感的消解或淡化将直接影响核心价值观的生存。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认同感或国家意识的淡化必将使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成为巴比伦塔之类的空中楼阁。因此，为擢升民族意识、保全民族在国家 and 阶级消亡之前立于不败并使其利益最大化，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使承载民族情感与价值、审美与认知的文学经典当代化。这既是优秀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也是温故知新、维系民族向心力的必由之路。于是，如何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面临危机之际，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坚守和修缮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极其紧迫的课题。这其中既包括守护美好的传统价值，也包括使美好的传统价值焕发新的生命力。

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一句古为今用便可以迎刃而解的。盖因时代有所偏侧，同时这是由文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决定的。

四、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

克罗齐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世界文学”，便是基于对跨国资本主义的认知。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因此，其概念完全不同于1827年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猜想。盖因在歌德那里，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基础之上，而是出于对《好逑传》或《沙恭达

罗》之类的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并存与交融。这多少在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儿产生了回音。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已然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

人类的自然需求式生产方式早已被资本驱使下的时尚制造方式所取代。人为的摩登、挖空心思的创意在资本的驱动下不断翻新并制造利润。传统（包括认知、价值观和审美方式）遭到了背弃。这不仅是诸君无谓地抢救“文化遗产”（包括早已被文明遗弃的巫巫傩傩或巫不巫傩不傩的劳什子）的理由，也是人们拼命强调国学（包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潮和近20年的“国学”热）的重要依据。

然而，西风浩荡，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取代性、颠覆性和不可逆性的。不仅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人性如此。一切悖逆只不过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是，跨国资本主义正在使人类价值、审美乃至语言向资本支配者趋同。于是，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必然显形，而且已然显形。于是，尽可能地守护美好的民族传统不仅是出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需要，更是重情重义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盖因文学是加法，是不可再造的。套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没有伽利略，也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若没有曹雪芹，又会有谁来创作《红楼梦》呢？这种不可替代性和偶然性决定了文学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或染色体的重要地位。这并不是说只有传统的才是美好的，而是在于如何使传统获得升华与新生。瓦格纳的名言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即使模仿也是为了创造的继承，而非简单复制。这就需要探寻和把握艺术规律。遗憾的是，目前充斥我国文坛的恰恰是山寨版产品，以至于精神垃圾较之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美其名曰“审美生活化”、“生活审美化”）、卡通化（所谓“图文时代”）、杂文化（所谓“国际化”）等去传统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其所承载或导致的价值混乱和认知错乱愈演愈烈。

然而，危机是全人类的。用古人的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今，诸多民族语言正像许多物种一样快速消亡。就连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也感到了来自资本主要支配者的话语压力。都德所谓“只要法语不死，法兰西民族将永远存在”的著名论断即将变成悲惨的箴言。强势的资本话语似黑洞化吸，正在饕餮般吞噬着各弱小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作为大到世界观，小至语言、风俗、情感等等的重要载体，各民族文学也日益表现出“国际化”流行色调。

然而的然而：真正的艺术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面对自我、时代和自然的抑欲与纵欲及其广阔的中间游移状态，即物质与精神的共生与对立、互动和调和程度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文学经典每每藉当代化和理想化了的传统以抵抗物欲与时流。这听起来或许有些保守，但综观世界文学经典，又有哪几种不是

取法保守、取胜于保守的呢？

以上只不过是历史—现实—未来和作家—作品—读者向度或坐标上的一种言说。因此，严肃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必须立足当代，同时又着眼过去，胸怀未来，而不是趋前不顾后式的追逐与同欢，或一味地玩“空手道”，甚至闭门造车、钻牛角尖。

简言之，跨国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一环，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它的出现不可避免。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上预言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分国别、不论民族，向着资本和资本家开战，进而实现人类大同——共产主义。但前提是疯狂的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让世界有那么一天，前提是我们必须否认“存在即合理”的机械命题，并且像马克思那样批判资本主义。

是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向马克思学习，在认清资本丑恶本质的基础上批判跨国资本主义，从而对诸如村上春树、纳瓦勒·赛阿达维、伊萨贝尔·阿连德等东方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作家保持足够的警觉。盖因资本所奉行的逻辑、遵从的价值、浸润的意识形态色彩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如何从我出发、知己知彼、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地了解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有持有守、进退有度地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创造性地守护和发扬全人类的美好传统，使中华民族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上获得提升和超越，无疑是中国人文学者面临的紧迫课题。

谢谢大家！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闭幕词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 王守仁

尊敬的各位专家、老师们、同学们：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新世纪外国文学：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已圆满完成了预定的议程，即将落下帷幕。我受组委会委托，作一个简短的总结发言。

根据会务组提供的信息，参加本届年会的正式代表 101 人，来自全国 41 个科研机构 and 高校，还有 30 多人从周边高校闻讯来聆听。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学术水平高。这次来开会的代表中有不少是中国一流专家，他们把一流的成果拿到这里来交流、展示，使会议成为“思想的盛宴”，我个人感到收获很大。

第二是涵盖语种多。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西班牙、日本、加拿大等主要国家的文学都有深入研究，这在其他全国性学会会议上是没有的。会议信息量大，开阔了大家的视野，各个国别文学研究相得益彰，也为我们提供了相互学习、相互激励的难得机会。

第三是讨论充分深刻，有交流、对话、论辩，各抒己见，思想有碰撞。青年教师表现很好，虽然年轻，但有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次会议时间不长，却精彩不断，从大会的发言和分会场的讨论来看，组委会提出的七个议题均有涉及。在此，我对代表们的发言作一点简短的回应。

我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宁波，想了解我们的同行在思考什么、在研究什么、在关注什么。陈众议所长的开幕词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意见，讲得很深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疯狂的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我们确实有危机感。他指出：如何从我出发，知己知彼、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地了解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守护和发扬全人类的美好传统，使中华民族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上获得提升和超越，成为中国人文学者面临的紧迫课题。我们从事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要有责任感，有意识地去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坚守和修缮我们的精神花园。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传承与发展”。申丹教授的报告紧扣这个主题，着重讨论修辞性叙事研究如何突破自我禁锢，获得发展。吴晓都研究员的发言重新审视俄苏文论的学科建构意义，分析俄苏文论如何在继承传统中发展与创新，讲得非常好。

本届年会的一个分议题是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教学十分重要，涉及外国文学人才



培养、外国文学事业的未来。无论是在文学院，还是在外语学院，外国文学教学都遇到了新的挑战，存在一些问题，老师们有困惑。我个人的观点是：改革教学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是可以把外国文学课上好的。关键是要有精彩的学术思想、生动的教学。殷企平教授在发言中提出要帮助学生理解文本，把握细节的象征意义。隋刚教授就如何激发学生想象力作了示范。我们要了解教学对象，适应学生、引导学生，在学生思想感情与生活实际间建立起联系，创新外国文学教学。

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学科史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叶隽研究员在分析冯至先生与中国德文学科关系时强调了学术史的重要性。汪介之教授呼唤编著学术型“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邹建军教授主张将“外国文学”教材和“外国文学史”加以区别，编著外国文学史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就外国文学研究而言，我们要坚持以学术为本，注重学术积累、学术创新，推动外国文学学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有世界眼光和中国视角。几位老师在讨论编著《外国文学史》时都提到比较的意识、比较的视域。我的理解是我们的研究要立足中国，对中国学者的立场、自我要有自觉，这对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尤为重要。

我们这次会议在宁波大学举行。浙江的老师们充分利用靠近大海的自然条件，开展富有地域特征的海洋文学研究，这也赋予本届年会不同于以往各届年会的特色。

宁波大学的老师们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研究海洋文学的成果，同时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提供了热情服务，他们的会务工作认真、细致。在此，谨向宁波大学外语学院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会议协办单位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别是要感谢陈众议所长、吴晓都研究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对本届年会十分重视，在会议筹备期间，书记、所长、科研处长、研究员都做了大量工作，对会议给予了学术指导和帮助支持。外国文学研究所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的驻所单位。我们学会管理规范，团结和谐，被民政部评为“先进社团”，这与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正确领导、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各位专家、老师们、同学们，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时间有限，空间有限，但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却是无限的。我希望会议结束后，各位代表把会议的精神带回去，传承发展，以巨大的学术热情、认真的研究开展工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注入活力，创造辉煌！

最后祝大家旅游开心，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一路顺风！谢谢！

外国文论与批评模式的
传承与发展

自我禁锢与突围：^①

美国修辞性叙事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申 丹

内容提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国际叙事研究的中心，修辞性叙事研究是当今最有影响的三个叙事研究流派之一。在 20 世纪中叶创立小说修辞学的布思是芝加哥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当今修辞性叙事研究的领军人物费伦和拉比诺维茨则是芝加哥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这两代人的研究都深深打上了芝加哥学派第一代设立的学科范畴的烙印。在与新批评派的争斗中，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将注意力聚焦于文本的结构关系，反对关注文字技巧。与此同时，他们又跟新批评派相类似，主张聚焦于文本，反对文学的历史研究。像很多其他流派一样，这种自我设定的研究范围使该流派具有了鲜明特色，但与此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延续至今的自我禁锢。本文研究这种传承关系，并指出：若要成为一种更好的批评方法，修辞性叙事研究就需要突破自我禁锢，将结构分析和文字分析相结合，将文本考察与语境考察相结合，同时还需要将文内研究与文间比较相结合。

关键词：修辞性叙事研究 传承 自我禁锢 突围

作者简介：申丹，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叙事理论与小说阐释；文体学；翻译学。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叙事转向”，叙事理论和批评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纷呈不一的研究流派。在美国，最有影响的是修辞性叙事研究、女性主义叙事研究和认知叙事研究。修辞性叙事研究聚焦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又称“作者的读者”）之间的交流。韦恩·布思是当代修辞性叙事研究第一阶段（20 世纪 60—80 年代）的领军者，詹姆斯·费伦和彼得·拉比诺维茨则是第二阶段（90 年代至今）的领军者。这些学者都属于芝加哥学派，布思是芝加哥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费伦和拉比诺维茨则是芝加哥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们不像第一代前辈那样聚焦于文本诗学，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修辞交流关系，但在很多方面他们的研究都带

^① 本文已经在《外国文学》2011 年第 6 期上发表。

有以 R. S. 克莱恩为代表的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研究方法的烙印。芝加哥学派对于自己的研究与其他流派之不同加以了清晰界定，这使芝加哥学派具有较为鲜明的特色，对文学批评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但像其他批评流派一样，这种学科界限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了自我禁锢，带来了一定局限性。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第一代到当今的第三代，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具有两种排斥性，一是排斥对文字技巧的研究，二是排斥对创作语境的关注。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芝加哥学派在这两方面的传承，探讨这对当今修辞性叙事研究造成了什么影响，并进而指出要怎样做才能突破这些自我禁锢，使修辞性叙事研究成为更强有力的批评方法。

一、对创作语境的持续排斥

芝加哥学派又称新亚里士多德派。第一代芝加哥派学者追随亚里士多德，把文学作品视为模仿物，反对在文学批评中进行历史考察。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R. S. 克莱恩在其《文学研究中历史与批评的对立》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中，指出文学是艺术产物，而历史研究的方法难以解释文学的审美效果。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是一种“具有理性的”话语，其研究对象是作为艺术品的作品本身^①。尽管芝加哥学派与新批评派在阐释方法上存在重大差异，在以文本为中心这一点上，两者却达到了一致。

第一代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排斥语境，是因为长期以来历史研究的方法在文学批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忽略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他们对语境的排斥构成一种“矫枉”的努力。第二代芝加哥学派遇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学术氛围。当布思的《小说修辞学》于 1961 年问世时，形式主义批评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对历史语境的排斥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该书的序言中，布思毫不隐讳地直言：“我研究的对象是非说教性小说的技巧，这是与读者交流的艺术……在探讨作者控制读者的手段时，我武断地将技巧与所有影响作者和读者的社会、心理力量隔离开来。”^②当时文本的中心地位已经牢固确立，不仅社会语境而且作者意图都被排斥在外，以至于难以探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正是修辞学家所关注的。在形式主义一统天下的氛围中，作为修辞学家的布思提出了“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我们需要从编码和解码这两个角度来看“隐含作者”^③。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特定立场来写作的作者（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作者”）；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断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真实作者”的形象则需要根据传记、信件

① R. S. Crane, "History versus Criticism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1935), in R. S. Crane, ed., *Idea of the Humanities and Other Essays: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67, p. 111.

② 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61.

③ 详见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Dan Shen, "What is the Implied Author?" in *Style*, 45 (2011), p. 80-98.